

历史呈现与茅盾文学奖的“题材类型”分析

任东华

(衡阳师范学院, 湖南衡阳, 421008)

摘要: 从核心的文化特征来看, 茅盾文学奖获奖篇目的题材可以分为地域、时间、事情和形象四种类型, 它们粗略地呈现了茅盾文学奖的风貌, 但也存在不少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关键词: 历史呈现; 茅盾文学奖; 题材类型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自第三届起, 茅盾文学奖就饱受争议, 如对评委会、评奖程序以及文学史价值等方面的质疑与批判, 但主要焦点则在于评选结果能否代表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的“高峰走势和存在真相”?如果说“高峰走势”是对“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程度”之评价的话, “存在真相”则寄寓着对“写什么”的总结与期待。因此, 从“题材”[1]角度来返观茅盾文学奖、考察它如何以“所述”来反复建构自己的总体形象并审视它与当代文学的“内容传统”之关系, 就显得既合乎逻辑又很有必要性了。

不过, 从文学经验来看, 以题材作为创作的评价标准又确非易事, 这不仅在于不同的时代、阶级和民族对题材的看法、要求与提倡不同, 作者的题材选择要受制于个人的观念及条件, 并且, 一种题材会包括着多种截然相异的文本, 而一个文本又会隶属于互不关涉的题材。当然, 尽管题材纷纭复杂, 但也会“有章可循”, 根据题材的核心特征, 与境遇互动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指向及其“命名”, 我们可以从多个维度把所有题材概括性地划分为“地域”类型、“时间”类型、“事情”类型和“形象”类型等。在此, 我们将以之为标准, 考察新时期以来的题材浪潮与作为主旋律文学、作为力求“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典范文本以及具有社会主义文学性质的茅盾文学奖的题材选择。

一、“地域”类型

自“五四”以来, “写什么”就成为新文学的首要话题, 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 当然也经历过不少曲折。1979年, 邓小平在《祝辞》中强调“我们的文艺”必须充分表现人民的优秀品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之后, 又着重指出必须坚持“双百方针”, 要“敢于创新”, 他引用列宁的话说, “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 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2]同时, 文学的主体性复苏、思想解放运动展开和持续深化的改革开放都有力地推进着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与小说繁荣, 种种题材也蜂涌而出, 或处于争议焦点, 或追逐创作浪潮, 成为“一时之盛”的创作景观。其中, “地域”类型也相应地由此前的“一体格局”向此后的“多极化秩序”勉力拓展。

所谓“地域”类型, 并不专指某种具体题材, 而是对若干题材的总称, 这些题材都是以“地域”来进行“宏观”命名的, “地域”并非地理学方面的确定所指, 它是对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存在范围或空间的概括, 如农村、都市、海外之类, 所以, “地域”题材也就包括了农村/乡土题材、都市题材、海外/国际题材、港澳台题材、西部题材等。就近三十年而言, 由于鲁迅、赵树理、柳青等人深厚的“农村/乡土”传统, 中宣部与中国作协关于“三农”问题之类

的创作倡导,最先始自农村的社会变革等因素,农村/乡土题材成为当代文学的“最大家族”。或歌颂农村的改革开放,或追述农村荒诞的政治运动,或回顾农村历史斗争与苦难,或批判农村的封建文化意识,或铺展农村的田园风味,这些题材揭示了农村的种种真实与农民饱经沧桑的精神史,促使整个社会反思并自觉参与农村艰难的现代化进程,茅盾文学奖对此也予以了聚焦。据统计,在八届评选的38部获奖作品中,农村题材达11部,占29.8%。其中,《芙蓉镇》描述1963—1979年间南方乡镇极富风情的社会生活和胡玉音、秦书田与王秋赦等人在“左倾”政治运动中的跌宕命运。《骚动之秋》讲述的是在商品经济大潮的深入冲击下,“农民改革家”岳鹏程为改变家乡面貌,力除陈弊,大胆革新,使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并带来了人际关系的巨大变化。《秦腔》对变化中的乡土中国所面临的矛盾、迷茫,做了充满赤子情怀的记述和解读。它们概括性地纪录了“共和国农村”的变迁史,还有《黄河东流去》《白鹿原》《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湖光山色》检视了中华民族筑基于农村的执著、坚韧与真实等。由于对农村题材有深厚的写作经验和传统,所以,尽管意识形态浓厚,但评论者认为无损于它们的思想深刻和复调性;尽管遵循的是现实主义,但丰富的生命与生活体验却拓展了艺术的精致和深化;以及强烈的乡村文化意识,都使它们有着难得的可读性与研究价值。然而,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都市化进程,农村题材也在创作中不断萎缩,反思生活和现实的力度减弱,因此,如何进行叙事转型,重振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值得深思。

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都市题材也被重新接续。不过,与郁达夫等人内在地拒弃、对抗乃至否定不同的是,张洁等人不但发现都市是当代社会与生活的支点,而且还是他们实现理想与找到归宿的平台,他们开始了“进入”都市的过程。或留恋宗法制都市温情脉脉的市民文化,或想象都市幽远怀旧的历史回声,或深入都市内部的权力斗争与财富掠夺,或描述全球化与现代化境遇中的“都市”重构,或挖掘都市的藏污纳垢及其子民顽强的生存活力,或赞叹都市所承担的当代文明创新,或毫不掩饰对自由、奢侈、刺激、消费以及享乐等生活方式的迷恋与颓废精神。就茅盾文学奖的9部(24.1%)作品而言,《沉重的翅膀》描述了国务院重工业部与所属的曙光汽车制造厂围绕工业经济体制改革所进行的尖锐斗争。《抉择》描述了市长李高成依靠党和群众与腐败分子展开殊死斗争并取得胜利,从而维护了国家利益。《英雄时代》通过史天雄和陆承伟各自在家中和社会的利益冲突、关系纠缠及起伏浮沉,讨论了我国私营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地位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等问题,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则没有都市题材获奖。从它们来看,“人事”把都市当作表演舞台并凸现出强烈的伦理与道德意识,并且,“人事”与都市还未内在融合,都市题材还欠缺源自本性的时代性与现代性。它们与《钟鼓楼》(四合院文化)《长恨歌》(弄堂文化)一起,共同从微观和宏观方面阐释着都市,但这种阐释却止于社会与文化层面,个人的都市体验却没有落到源自生命的本能层面。总之,由于中国人的乡土根性,作家们对都市题材的把握还欠缺主动和自我融入,他们一方面站在乡土立场,但又身不由己投入社会与都市共谋的狂欢仪式;一方面又依恋现代的审美精神,在对都市的文明病、欲望、堕落等的批判中却又滋生出无根的恐惧和漂泊的茫然,总有把都市模糊化乃至农村化的潜在冲动。所以,我们可以理顺很多作品的都市题材来源,却难以把它们看作完全现代意义的都市小说,这些获奖作品也不例外。

除了《额尔古纳河右岸》与《尘埃落定》因分别反映鄂温克族人与藏族人的二十世纪生活变迁可称为“边地”题材之外,从其它作品来看,由于没有形成核心的“地域”倾向及其文化特征,所以难以归入“地域”题材,海外题材与港澳台题材是新时期之后才出现的,但发展迅速。前者是指中国人在海外留学、打工、公干以及其他,适应外国文化,艰难创业,

乡愁以及荣归故里的沧桑与感慨,给读者以崭新的异域印象并激起读者的成功幻想,如《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乌鸦》等;后者是展示港澳台迥异于内地的生活方式、与大陆同根同种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以及双方的频繁交流等,如阎延文的《台湾三部曲》;西部题材则以西部独特的地理、生态、人文等为创作对象如《藏葵》。与传统题材的“深厚”相比,它们以“新”拓宽了读者的视界并在近年反响很大,尽管还未进入茅盾文学奖但无疑为之增加选项。

从题材的反映“空间”而言,与“新题材”相比,茅盾文学奖由对“农村”与“都市”的集中想象而倾斜于传统的农村题材与都市题材,这固然有“思想与艺术”之因,但也可能使评奖形成潜在的“题材印象”并出现“重复与单调”的倾向,我们要警惕它对“多样化”的冲击以及对“新题材”形成抑制。

二、“时间”类型

“时间”是指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由过去、现在和将来构成的连绵不断的系统,是物质运动的持续性和顺序性的表现。[3]“时间”类型是对所有以“时间”进行“命名”的题材之总称,为了表述和研究方便,根据题材所反映的“时间”,又可把“时间”题材归类为历史题材、现实题材与未来题材。在此,我们将结合茅盾文学奖、新白话文学实践与叙述对象的性质及其所处年代等分别述之。

历史题材。在叙述的连续性与叙述内容/方式所构成的坐标系上,历史题材呈现为复杂的网络状态。就叙述的连续性而言,借助“历史分期”的概念,历史题材可分为“古代”题材(—辛亥革命)与“现代”题材(辛亥革命—1949年)。五千年的文明积淀,远离政治敏感区与借古人抒“我”之情传统,特别是“49”后关于“历史与历史剧”的探讨以及《李自成》(第二卷)出版,使“古代题材”成为新时期以来的创作潮流,结合文本审美类型的多样性与主题思想的厚重来看,姚雪垠等人就厚积薄发并捧出了各自长卷,如《李自成》(第3-5卷)以及穆陶“鸦片战争系列”、杨书案“中华文化溯源系列”、二月河“落霞系列”等,若干题材还形成了创作热点。其中,有6部(15.8%)作品获茅盾文学奖。《李自成》(第二卷)写农民起义军如何在商洛山区重振旗鼓并向盛期发展。《白门柳》写明末清初的知识分子在国破家亡之时的人生选择与命运悲剧。《金瓯缺》描写的是十二世纪前半期中国内部宋、辽、金之间的民族战争,还有《少年天子》与《张居正》,它们表现了身不由己但殊途同归的末世之痛。就“现代”题材而言,亲历经验、国家意识形态支持以及“现代史”如辛亥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的丰富与厚重,特别是它们仍持续地影响当代生活,所以不少作家对它深怀感情并倾心挖掘。在新时期后的文学创作中,它们也成就斐然并有10部小说(26%)获茅盾文学奖。如前述的《黄河东流去》《白鹿原》以及《第二个太阳》《穆斯林的葬礼》《浴血罗霄》《战争和人》《尘埃落定》《东藏记》;另有《长恨歌》《冬天里的春天》《茶人三部曲》《无字》《历史的天空》《额尔古纳河右岸》、《你在高原》、《一句顶一万句》等8部(21%)则贯穿“49”之后。其中,《尘埃落定》讲述的是藏族地区在康巴土司制度崩溃之前混沌、野蛮、残酷的生活。《茶人三部曲》通过茶商杭家的起伏浮沉,反映了中国社会在20世纪的风云变幻,《额尔古纳河右岸》以温柔的抒情方式诗意地讲述了鄂温克族人的顽强坚守和文化变迁,等。这段火热与激情的历史,已潜在地凝聚成中国人拂之难去的“现代情结”。

就叙述内容/方式而言,借助“现代性”的概念,历史题材可分为“正史”题材与“外史”题材。“正史”题材根植于古代的史官文化,是从官方立场出发,以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为

标准,从重大事件、杰出人物或集体想象等出发“实录”历史与社会主潮所形成的创作题材,讲究“求真”/客观性原则。在新时期后,它处于主流地位,就茅盾文学奖而言,《李自成》《少年天子》《金瓯缺》《白门柳》《张居正》《黄河东流去》《第二个太阳》《浴血罗霄》《白鹿原》《战争和人》《东藏记》《冬天里的春天》《茶人三部曲》《历史的天空》《暗算》等16部(42.1%)作品都可划入“正史”题材范畴。其中,《战争和人》通过上层官吏童霜威及其家人的生活遭际,较全面地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广阔的社会历史状况。《白鹿原》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家族和封建文化本质,反映了“1911-1949”年间的历史真实与时代精神。在实践中,“正史”题材创作也逐渐摆脱传统的僵化模式并出现诗化、文化化等倾向,如《东藏记》《第二个太阳》《茶人三部曲》。“外史”题材既承续古典的稗官野史文化,又受到克罗齐“当代史”观念之影响,撰史者从民间立场出发,依据个人经验、趣味与判断,对形成历史的所有对象平等相待并意图性地打碎与切割,在边缘想象中自由构造“历史”,呈现出松散与不确定状态,讲究“求在”/主体性原则。由于改变传统的历史观念,既以“陌生化效果”带来审美冲击,但过度“创造”也会破坏历史的尊严。如刘震云、王小波、二月河、格非等人对历史的“戏拟”或“反讽”并未得到合适的理解,倒是阿来、王安忆、霍达等人的“外史”题材创作被文化、宗教或女性等名义所置换或解构,并被纳入主流文学系统。如《穆斯林的葬礼》《无字》《长恨歌》《尘埃落定》《额尔古纳河右岸》《一句顶一万句》6部作品(15.8%)荣获茅盾文学奖。其中,《穆斯林的葬礼》是从伊斯兰教角度、《长恨歌》是从都市女性角度、《无字》是从知识女性角度、《尘埃落定》是从傻子角度来认知“现代中国史”的,带有历史解密的性质。“外史”题材在当代表现得极为芜杂,包括“新历史”小说甚至“反历史”小说等。

第三,“现实”题材。我们把当代题材命名为“现实”题材,主要是增加文学叙述的现场感、作家对题材把握的时效性以及直面“现实”的良知与勇气。尽管三十年来,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曲折不已,但批判、干预现实并弘扬主旋律,始终是当代文学的骨气与精神能力所在。茅盾文学奖也是如此,从题材来看,有表现抗美援朝的,如《东方》;有表现与“四人帮”斗争的,如《将军吟》;有表现“左倾”政治的,如《芙蓉镇》;有表现城乡改革的,如《沉重的翅膀》《平凡的世界》《都市风流》《骚动之秋》《英雄时代》《秦腔》《湖光山色》;有表现反腐的,如《抉择》;有表现平民日常生活的,如《钟鼓楼》;还有另类文本《暗算》《推拿》《天行者》《蛙》,共16作品(42.1%),可谓丰富多彩了。其中,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表现了对“当代”对重点关注,如《秦腔》见证了清风街近二十年来众生的生老病死,展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暗算》表现了当今的无名英雄——谍报人员之破译密码的传奇故事;《湖光山色》更关注当代农民对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等。但这些都与生活的巨大容量相比,它们仍为“沧海一粟”。特别是“92”之后,市场经济的冲击与文学的边缘化境遇,使“现实”题材一方面出现媚俗甚至与现实“同流”现象,一方面又要承受“艺术粗糙”的指责。有识之士纷纷呼吁要加强文学的责任感,要改变文学的冷漠与物化局面,要提高文学的格调与超越性以及作家要不断“充电”,丰富自己的库存。这或许将有助于“现实”题材创作在当前取得更大的突破。

与之相比,未来题材主要表现为幻想题材。所谓幻想题材,就是凭借丰富的想象力,虚构一个我们这个世界所不存在的不可思议的世界,在这个“第二世界”里展开连续的故事。【4】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幻想文学体裁萌生于19世纪末的英国并且是在1997年才由彭懿等人传入中国,但中国从古代的《山海经》《封神演义》《西游记》到20世纪中期的《从火星到地球》(郑文光)、《小灵通漫游未来》(叶永烈),形成了中国的幻想文学传统。到新时期以来,则出

现了大批幻想文学作家如杨鹏、星河、韩松、何夕、王晋康、刘慈欣等人。【5】但总体而言,这是我们过去所忽略的一个门类,茅盾文学奖就更不用说了。

从对“时间”题材的概括来看,茅盾文学奖的“现代”题材与“现实”题材重于“古代”题材,“正史”题材重于“外史”题材,“现实”题材重于“幻想”题材。

三、“事情”类型

事情是指在历史上或社会上所发生的行为,它“大”可以影响/改变历史与社会的方向和进程,这主要是指人类群体行为如战争/军旅、改革、和平、反腐等;它“小”至个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悲欢离合以及其他与宏大叙事无关的写作等。相应地,“事情”类型不但包括所有以“事情”命名的题材如战争/军旅题材、改革题材、和平题材、反腐题材、打工题材、婚恋题材等,而且也在文学实践中形成了反映历史与社会大潮的“重大”题材与处于历史与社会运动边缘的“一般”题材之别。在当代文学史上,“重大”题材曾被大力倡导并得到国家意识形态支持;“一般”题材则被认为是“写身边琐事”而横遭批判。【6】新时期以来,尽管创作界深刻反思“文学重要的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并实现了“自由选材”,但正如鲁迅主张“选材要严”的看法一样,他们还是普遍认为,“重大”题材的价值是优于“一般”题材的。以此来观照近30年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茅盾文学奖的第1-7届评选,我们就会发现“所言非虚”。

反思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几乎都贯穿着战争。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之伟力及其巨大胜利,战争本身所体现的残酷性、魅力以及为巩固当代中国的和平局面,众多作家回顾、审视并反思人类战争,使战争/军旅题材在新时期文坛异军突起,不但数量与种类繁多,而且从《西线轶事》到《亮剑》,无论是在审美观念、人物形象、价值取向等方面都取得了系列突破。其中,《东方》《李自成》《第二个太阳》《浴血罗霄》《金瓯缺》《历史的天空》《你在高原》等7部(18.4%)作品获茅盾文学奖。《东方》则从朝鲜战场(前线)与我国农村生活(后方)来全面反映抗美援朝的。《第二个太阳》写某部渡江南下解放武汉和进军湖南的辉煌胜利,歌颂新中国作为第二个太阳的诞生。《历史的天空》则通过梁大牙真实而丰富地反映了英雄在战争中的成长过程,《暗算》也可算使“准战争小说”,就它们而言,涉及到古代王朝的军事斗争、农民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间谍战争等历史。它们象丰富的艺术矿藏,是永远取之不尽的。不过,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如苏联的“卫国战争文学”、法国的“抵抗运动文学”、美国的“二战文学”等相比,无论是对战争的性质还是复杂性与世界性、以及作品的艺术方法等,都是有待深化和拓展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这不但根本改变着人们切身的利益关系,而且还方方面面地影响着他/她们的精神生活。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号召以及社会的巨大变动所刺激的使命意识和功利意识,使改革题材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期待。自《乔厂长上任记》之后,就形成了蜂涌的文学热潮,如《改革者》《花园街五号》《新星》《浮躁》都曾引起过轰动。从城市到农村、从个人到国家、从物质到精神、从悲壮失败到不择手段地成功、从思想僵化到唯利是图,都在改革题材中得到全面反映。其中,有10部(26.3%)作品获茅盾文学奖。《少年天子》写顺治为融入汉族先进文化,虽屡受阻挠却力图变革的故事。《张居正》写“他”为实现“中兴”明朝之愿,不惜以铁腕和权谋治国,但因改革触犯统治阶级利益,最后以失败告终,它们是封建时代两次失败的改革纪录。《沉重的翅膀》与《英雄时代》是对改革所遭遇的瓶颈问题——经济体制的思考,前者表现了难

度与勇气,后者则表现出深度与哲理。《平凡的世界》《骚动之秋》阐释了农村改革的错综复杂,《秦腔》《湖光山色》特别对改革开放年代乡村代价值观念与人际关系在传统格局中代深刻变化进行了全面解读。《都市风流》与《抉择》则展示了改革所遭遇到的新问题。或与改革过近,或是问题的敏感性,或市场经济对文学的磨蚀以及其他,改革题材在九十年代遭遇冷落和困境。不仅数量方面匮乏,如1995年、1996年、1997年的长篇小说与改革题材之比分别是 700/20、1998/20、1000/20,并且还存在着形象模式化、创作方法单调等“内虚”。【7】这些“内虚”恰恰又是所述获奖作品被经常诟病与否定的症结所在。如何发挥改革题材作为“重大”题材的价值优势,这正是我们当下亟需考虑的。

当然,就茅盾文学奖而言,还有包括着反腐题材(《抉择》),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题材(《冬天里的春天》《白鹿原》《茶人三部曲》《东藏记》),反“左倾”政治题材(《芙蓉镇》《许茂他的女儿们》),就它们与民族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或历史和社会的主潮关系而言,它们也属于“重大题材”范畴。

与之相比,也有若干获奖作品在取材方面并不突出,或是通过男女婚恋,或是通过平民的日常生活,或是个人身世以及情感倾诉,在茅盾文学奖中,《钟鼓楼》《长恨歌》《无字》《穆斯林的葬礼》《尘埃落定》《天行者》《蛙》《推拿》等8部(21.1%)即是如此。《钟鼓楼》选取的是北京九户居民在1982年12月12日早晨5时到下午5时一天里的日常生活。《长恨歌》描写一位四十年代平民出身,美丽、善良而又柔弱的女性的不幸一生和悲剧命运。《穆斯林的葬礼》写一个穆斯林家族三代人半个多世纪的生活。《无字》以女作家吴为的人生经历和情感生活为主线,展示了她及家族四代女性的爱情婚姻并揭示女性生存、生命及心灵之痛以及《尘埃落定》等。这些题材处在历史与社会主潮的边缘,不妨归之于“一般题材”的范畴,但作者们又通过精思附会,从中提炼出宏大深刻的主题,使作品价值不因题材而“废”,可以说,它们真正体现了“写什么”与“怎么写”在纯文学层面上统一的可能性及其程度如何。也正因为超越题材本身,并在主题方面与那些“重大题材”作品殊途同归,它们又区别并高于主动消解文本意识形态内涵的先锋文学、止于原生态呈现的“新写实小说”以及咀嚼于自我与身体的体验、感受及遭遇的“私人写作”。

从上述的比较看来,“重大题材”优于“一般题材”使茅盾文学奖一方面能本质性地概括和反映社会的发展主潮与趋势,但一方面也可能使它过度注重对“事”的呈现而忽略对“人”的关怀。如葛兆光所说,真正的历史应着眼于它的平均值即“人”的日常生活层面,但“重大题材”在这方面仍然有所欠缺,“一般题材”也担心过度纠缠于此又可能影响主题深化。所以,这种“重大题材”优于“一般题材”所带来的“苦衷”,使得诸多评委在申述某些作品的获奖理由时总是难免尴尬:为什么是“思想深刻但艺术有待改进”而不可以“艺术精湛但思想有待提高”?

四、“形象”类型

形象是文学艺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形式,是作家艺术家审美认识的结果,是他们根据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集中、概括、创造出来的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审美意义的具体生动的人生图画,包括各种各样独具形态的物体和千差万别的情绪状态,但以人物形象为主。【8】在中外文学史上,文学“类象”不计其数,比如新时期以后就出现过工人形象、农民形象、军人形象、知识分子形象、公务员形象、中产阶级形象、革命者形象、女性形象等。相应地,我们也可以把它们所属的题材称为工人题材、农民题材、军人题材、知识分子题材、公务员

题材、中产阶级题材、革命者题材以及女性题材等。由于这些“人”在社会总体构成中的比例、地位及影响,文学政策对这些题材的支持力度、这些“类像”所具有的审美内涵及其号召力,或其它原因,所属题材发展得并不平衡,有的甚至差别很大。从茅盾文学奖来看,也是如此。

在33部获奖作品中,属于农民题材的有8部(21.1%),与农村题材相同。然而,从勤劳、善良、美丽又勇敢地追求“人”的正常生存与爱之权利的农村妇女胡玉音、面对苦难不失坚忍和顽强的李麦等人、不安现状勇于进取的新型农民孙少安和孙少平、儒家文化与宗法制社会代表白嘉轩、农民改革家岳鹏程、谨小慎微思想保守的传统农民许茂,神经质的引生,以及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芒的暖暖等形象返观农民题材,在承认它们的成就之时,也会容易发现它们内生的“空洞化”:自80年代起,“三农”问题已经十分尖锐并严重制约着国民经济安全,农民陷入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转型困境。然而,不仅茅盾文学奖甚至当下文学,却缺乏这种直面现实的勇气、底层关怀自觉以及从负面、从潜意识或本能、从生命高度反思与建构农民主体的意识,由此,茅盾文学奖乃至当下文学有理由让人怀疑:它们是否已失去了批判现实的精神能力?

军人题材则不但包括战争小说,而且还包括军旅小说、革命小说以及和平小说等。从茅盾文学奖来看,共有9部(23.7%)小说属于军人题材。《李自成》与《金瓯缺》属于古典军人题材。《东方》《将军吟》《冬天里的春天》《第二个太阳》《浴血罗霄》《历史的天空》《暗算》则属于革命军人题材。从抗美援朝英雄郭祥、与“四人帮”不屈斗争的空军某兵团司令彭其、陈镜泉和胡连生、革命干部余而龙以及秦震、陈文洪、梁曙光、梁大牙、钱之江等军人来看,这些题材一方面正面表现了他们坚定的革命信仰、乐观的革命精神、顽强的革命斗志以及永不言败的革命气概,一方面从中外文学的军人画廊来看,这些军人性格有定型化倾向,“军性”大于“人性”,“英雄性”高于“凡人性”,对军人的道德诉求胜于审美期待;缺乏对“敌方”军人、和平时期的军人与外国军人的有力塑造,等。从茅盾文学奖的参照来看,军人题材还有待突破某些禁区,进行深化与拓展。

文革以后,知识分子题材迅速兴起,这首先在于经历过文革炼狱之后,知识者对自己的命运、岗位/责任及身份/角色的转换和思考。从“我是谁”、“我能做什么”到“我应该怎么做”,知识分子题材多方面地展现了他们在时代潮流的锤打之下寻找和重构“自我”的艰难、沉重与尴尬。在众多作品中,有5部(13.2%)获茅盾文学奖。其中,《穆斯林的葬礼》讲述的是两代知识女性在时代、宗教与家庭伦理等情境下的爱情与生活悲剧。《白门柳》描述的是明末清初的文人们如钱谦益、黄宗羲、冒襄、陈贞慧、侯方域以及方以智等人在动荡之世的生存/生活方式、命运变迁及人生选择的复杂性。《东藏记》生动地描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国难临头、颠沛流离的生存境遇中所表现出的人格操守和精神境界,彰显了知识分子的社会道义与责任以及《无字》讲述的知识女性所遭遇的男权压制与反抗之艰等。从总体来看,知识分子一方面能够主动地把握“自我”,一方面却又无奈地被社会所裹挟,所以它们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与实际处境揭示得相当深入。不过,与其他“形象”题材相比,又表现出对他/她们的当代境遇及现实选择欠缺针对性。

尽管“女性文学”还概念未清,但关于女性题材的创作却是从“五四”开始的,新时期得益于西方现代的“女性理论”,许多作家与学者共同推动着当代的“女性写作”,如从张洁创作中的女性意识觉醒到陈染、林白和海男等人把女性意识主体化,再及女性意识的权利化等。其中,《长恨歌》《无字》等2部(5.2%)小说获茅盾文学奖。它们一方面表现了女性处身于男权社会的生存之艰,她们必须依靠男性帮助才有“资格”做真正意义上的女人,并找到被历史

与社会所遮蔽的女性意识；一方面也表现了这些女性在获得女性意识之后，面对男性暴力和诱惑，究竟是对抗还是和解以及女性怎样才能完全拥有自己？在这种清醒的质问背后，表露的是它们对“解”的茫然。由此也导致女性题材能够成为热点话题，但创作却徘徊在当代文学边缘的真实处境。

当然，就茅盾文学奖的构成来看，我们还可以就其他形象概括作品的所属题材，如市民题材《钟鼓楼》与《都市风流》2部（5.2%），属于谍战题材的《暗算》，属于少数民族题材的《穆斯林的葬礼》《尘埃落定》《额尔古纳河右岸》3部（7.9%）等。不过，就新时期的文学版图来看，与巨大的社会变革相呼应，文学领域也出现了知青题材并涌现了张承志、梁晓声、老鬼等代表性作家；中产阶级题材，讲述都市白领的现代生活；老板题材，讲述中国“先富起来的人”的奋斗史和命运。同时，打工者、代理商、留学生、儿童以及传统的“工人”等形象都成为文学的创作题材。与之相比，传统的农民题材、军人题材在茅盾文学奖中比例最大，知识分子题材虽“历史悠久”，但较农民题材则少一半。同属传统的工人题材与新兴的知青题材、中产阶级题材以及“打工者、代理商、留学生、儿童”等方面的题材在茅盾文学奖中几乎没有。从中可以看出茅盾文学奖的形象版图构成失衡并潜在地暗示出它在题材类型方面还有丰富的拓展空间。

当然，我们也还可以从宗教题材、少数民族题材等角度来考察茅盾文学奖的历史呈现，我们选择“地域”类型、“时间”类型、“事情”类型、“形象”类型四种维度来审视茅盾文学奖第1-7届的题材构成，事实上也遭遇过饶芑子在研究华文文学、刘思谦在研究女性文学时所面临的同样问题：这就是概念及其义域限定。对此，葛晓音在谈到诗歌研究时也深有感触地说：“研究某一类诗歌题材或形式的纵向流变，较难掌握的是研究对象的概定，以及贯穿其中的主线，中国诗歌的任何一种题材或形式都不可能具有严格的界定范围，一定会有部分作品界限不清，与其他种类相混淆。所以几乎选择单一诗类进行渊源流变研究的课题都难免遭到概念界定的质疑。”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把某种文学现象界定得多么清楚，而在于是否抓住了这一诗类的内容和表现的基本特征，能否有条理地论证其如何踵事增华的过程。”^[9]所以，我们通过这四种维度，详细分析第1-7届茅盾文学奖的题材类型并对它作出全景描述，目的并不在于以绝对标准来平衡茅盾文学奖的题材选择，而是试图展现它的存在真相，理清它的争议根源，以便为茅盾文学奖的正常发展提供一份参照。尽管并不精确，但概述所呈现的对传统题材的“倾斜”，在整体观照中所出现的“现代”题材与“现实”题材重于“古代”题材、“正史”题材重于“外史”题材、“现实”题材重于“幻想”题材之“模式”，“重大题材”的“强势性”，以及形象题材版图失衡，使茅盾文学奖潜伏并积聚着“自反”的不利因素，对此，我们应该深刻反思。同时，茅盾文学奖也应该破除对题材的惯性思维并拓宽它的文学标准期待，在当代境遇下实现“最优秀”的“双百”选择，使之真正地成为中国文学永远的“尊严”所在。

参考文献

[1] 题材：是艺术家从现实生活中选取出来的，经过提炼加工而成为塑造形象、表现主题的一定生活材料，它是作品所描绘的具体事物。它已不是自在的客观实际的生活，而是被创作主体认识并把握了的对象性存在。在艺术反映中具有基础性意义，参见王向峰主编：《文艺美学辞典》，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52-253页。

[2]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人民日报》，1979年10月30日。

- [3] 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第1181页。
- [4] 张秋林：《儿童幻想文学：新世纪的世界潮流》，中国图书评论，1999年第6期。
- [5] 中青在线：《本土幻想文学不可言状的痛》，新浪网读书频道。
- [6] 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页。
- [7] 牛运清主编：《新时期改革开放题材长篇小说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
- [8] 郑乃臧，唐再兴：《文学理论词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8-9页。
- [9] 葛晓音：《秦汉魏晋游仙诗史研究的新创获》，《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05期。

History presented with Mao Dun's "subject type" analysis

Ren Donghua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unan Hengyang, 421008)

Abstract: From the core of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view, Mao Dun award table of contents of the subject matter can be divided into geographical, time, matter and the image of four types, they presented the Mao Dun's rough style, but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 to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Keywords: History presents; Mao Dun Literature Award; Type of subject matter

作者简介（可选）：

任东华，本名**任美衡**。湖南衡阳人，文学博士、博士后，副教授，2010年入选衡阳师范学院首批“英才支持计划”并兼任学校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湖南省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第四届中国文联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研班毕业，香港浸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访问学者，CSSCI 期刊《当代文坛》编委，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师从雷达、罗成琰、张炯、白烨等著名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光明日报》理论版、《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争鸣》、《南方文坛》、《中国图书评论》、《小说评论》、《当代文坛》、《文艺报》、《理论与创作》等专业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五十多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基金优秀青年项目等省部级课题十项，荣获湖南省文艺理论学会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五次。